

「文學與社會」——「新文化運動百年  
反思」首場會議綜述

“Literature and Society——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Conference on ‘One Hundred Year  
Reflection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汪 楊\*

Wang Yang

2014年12月28-29日，由北京大學哲學系、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浙江大學人文學院、臺灣大學哲學系、安徽大學文學院等聯合發起舉行的大型學術研究活動「新文化運動百年反思系列學術會議」在安徽大學召開。新文化運動從「文學革命」開始，涉及語言文字、文學思想、審美觀念等層面，而新文化運動的兩大旗手陳獨秀、胡適均來自安徽，因此，作為該系列學術活動的首場會議，即以「文學與社會」為主題，由安徽大學文學院承辦，來自北京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中山大學、武漢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首都師範大學、臺灣政治大學、臺灣東海大學、安徽大學等40餘位專家、學者，就

---

\* 作者現任安徽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文學革命與社會變遷」、「文學觀念的變革」、「白話文運動與文字改革」、「新文學的國際背景」這四方面分議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大會第一天上午安排了四位專家的主題報告。安徽大學文學院黃德寬教授以〈新文化運動與語文現代化的反思〉為題進行了首場發言，他認為「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一次思想啟蒙和價值重構的文化運動，其促使了漢民族共同語的形成，掀起了關於漢字存廢、漢字簡化等前途問題的辯論，而經由文學革命取得進展的語文現代化事業也在1949年後得以繼續發展。新文化運動百年來，語文現代化伴隨著現代化的進程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時，也面臨著新的問題，他認為新文化運動的精神遺產，應該由海峽兩岸和全體中國人共同繼承和發揚。就語文現代化而言，雖然兩岸的發展路徑和取向存在分歧，但兩岸語文政策總體上都是在沿著新文化運動先驅們開關的道路前進的，彼此應該相互尊重和認同，應共同制定消除語言文字分歧的規劃和目標，共同研製統一的語言文字規範和標準；另外，在推行漢民族共同語的同時，也應處理好語言多樣性的問題，理性對待漢字，珍惜漢字文化遺產。

臺灣東海大學歷史系的丘為君教授在〈革命與陳獨秀的國家想像〉的主題發言中，指出「新文化運動」在近代中國的成功不僅在某種意義上溶解了1912年初至1916年中長達約三年半左右的「袁記黑暗期」，也在創新的意義上——語言文字解放、婦女解放與思想文化解放等等，開啟了一條新的道路。他以陳獨秀在1914年11月《甲寅雜誌》發表的〈愛國心與自覺心〉入手，討論了陳獨秀的國家想像，他認為五四旗手陳獨秀在思想表達風格上、在講求新道德理想主義上、在關於國家建構方面都具有兩歧性的思想特徵，並指出這不只是陳獨秀所獨有，也是新文化運動領袖們常見的特質。因而，切斷了前《新青年》時期的陳獨秀思想（即是切斷了東京《甲寅雜誌》時期的陳獨秀思想），以及將《新青年》在國內所發動的新文化運動視為一個突然的、斷裂式的成功，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北京大學哲學系章啟群教授則以「美學與新文化」為例，進行了〈現代文明的中國與中國思想的困境——從美學與新文化說起〉的主題發言，他首先勾勒了美學學科在中國百年發展的大致歷程，分析了新舊學術轉換的內在軌跡與變異的相關因素，揭示了古代傳統學術向現代學科轉變的一般性問題及其對策，為中國現代學術發展提供一個參照。他認為中國思想和文化的歷史與西方存在著巨大差異。因此，建立現代中國美學，一方面，從學術本身來說，既需要參照西方的學術觀念和方法，又必須立足於中國自身的學術傳統；另一方面，從學術的功能來說，是在中國傳統的學術的基礎上，進行一種現代學術的內在「轉換」。在當今多元文化並存的世界面前，中國人文學科的創造性建構，需要對於民族文化傳統的自覺意識，還需要現實的強烈的文化生存觀上的意識。

中山大學中文系彭玉平教授在〈王國維與胡適：回歸古典與文學革命〉的大會發言中，認為追蹤現代學術史，王國維與胡適的關係是值得考量的重要篇章，彭教授認為王國維與胡適：一個曾被認為是遺老的代表，一個則被公認是新銳的象徵，但他們大致有從傾慕西方學術文化到回歸中國古典的經歷，而且因為這種經歷在時序上前後相承，共同構成了中國新文學與新文化進程中的重要關節，在「現代」的觀念裡，王國維與胡適註定是要擦肩而過的；而在「古典」的世界裡，兩人才會走到一起。隨後，彭教授以王與胡之間關於《教坊記》與詞的起源之關係的往返討論為例，具體分析了這兩位現代重要學者的學術交往。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陸建德教授對參加主題報告的四位專家進行了點評，他肯定了這四位學者在各自領域的研究與發現，指出了精彩之處，並就相關問題展開了論述。

在隨後進行的兩個分會場討論中，與會代表針對各自的議題進行了分組討論，每場討論均有發言人與評議人，同時還設有自由討論時間。

關於新文化運動中的文學變革問題，是本次會議中學者們重點關

注的議題。安徽大學文學院的王大明教授分析了中國文學現代傳統形成的路徑和結構，他認為中國文學現代傳統形成的「路線圖」及其既成的「結構圖」，實質上就是現代中國文學史紛繁複雜表象下本源性的「精神運動軌跡」和「精神結構圖」。它們是一切具體文學現象發展變遷的內在根源。武漢大學文學院的昌切教授則從研究晚清以來中國現代進程的兩個模式：基於歐洲中心主義的衝擊—反應（impact-response）或刺激—反應、影響—回應模式，和1970年代美國出現的中國中心模式入手進行分析，他認為考察晚清以來的中國，無論考察它的哪一個方面，僅從內緣入手肯定是不合適的。否定內緣的存在是愚蠢的，單看內緣也聰明不到哪裡去。不是所有外來的東西都有相應的內緣，當然，也不是所有自有的東西都截然與外來的絕緣。理想的辦法也許是：打通內外，內外結合，在歐洲文明向東輸出和擴散的大背景中考察中國的現代性。

臺灣政治大學歷史系劉季倫教授從清末民初的識字率入手，以魯迅的〈阿Q正傳〉為例，探究了魯迅在新文學運動中的轉向，他認為魯迅從進化論，終而迎向了左翼革命的路線，其中的關鍵，正是他對於文盲阿Q的處境的理解。劉教授認為〈阿Q正傳〉裡有許多人物，理解這些人物的社會位置、經濟地位，乃至於其時代意義，最重要的是去理解阿Q處境的成因。這不但是中國漫長革命的題中應有之義，更是我們理解這場革命的必要工作。安徽大學文學院汪成法副教授指出在關於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歷史的敘述中，南社常常是一個被忽略的群體，他從分析南社的思想文化觀念入手，指出南社代表了當年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共同的價值理念，而在經歷過一個世紀的激進變革之後，南社意欲存續「國魂」、「國學」的追求，在今天顯得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與價值，他們在西化大潮方興未艾之時「存國魂」、「存國學」的努力應該永被銘記。

浙江大學中文系的黃健教授則在新文化視域中探討了「五四」新文學的文化意義，他認為「五四」新文學的興起，構成了對古典文

學的文化審美形態的揚棄和超越，構築了向真正具有現代意義，或最具現代性的新型文學觀念、形態、體式進行轉變的新起點，也真正地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劃出了一條涇渭分明的分界線，完成了中國文學由古典向現代的價值轉換，獲得了自身獨立的精神品格和獨特的審美理想，成為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安徽大學新聞學院王天根教授則以《晨報》及其副刊為研究物件，分析了新文化運動的另類可能性，他認為新文化語境裡中國文學與政治時局多有回應，且又有著思想啟蒙重任。面對軍閥混戰下中國社會何去何從，諸多負荷下《晨報》及其副刊站在「問題與主義」的十字路口，無疑有著自己的猶豫與彷徨。時隱時現的新文化的另類可能性再度進入輿論議程。

新文化運動積極地啟動對西方文化的借鑒，與會代表們還專門針對新文化運動的國際背景問題進行了討論。北京大學外語學院程朝翔教授論述了中國新文化身分塑造中的莎士比亞，他認為從莎士比亞在新文化運動期間和前後的譯介、接受情況，可以看出中國在塑造現代的新文化身分時所面臨的問題、矛盾、衝突，以及為中國社會所帶來的變革、進步、發展。北京大學英語系副教授郝田虎則以辜鴻銘和吳宓對彌爾頓的接受為例，探究了新文化運動中的異見者，他認為彌爾頓是辜鴻銘和吳宓建造文化人文主義大廈的基石，辜鴻銘開了中西比較文化的先河，吳宓奠基了我國的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研究的基礎，在跨越東西方的跨文化實踐中，辜和吳代表了文化人文主義的兩個時代、兩個層次和兩種樣態，二者相通而又相異。北京大學德語系胡蔚博士則探討了當代中國啟蒙話語中的《浮士德》，她重點分析了改革開放後，中國學界在文藝評論和舞臺實踐中對於「浮士德精神」的執著、反思和質疑，以此闡釋浮士德形象在中國如何從「自強不息」的英雄、尋找出路的迷茫知識分子跌落到了罪孽深重的惡人，乃至遊戲人生的犬儒主義者，並指出《浮士德》在當下中國的接受史，具體而微地反映了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對啟蒙的多元認知。

北京大學中文系張麗華博士將魯迅的短篇小說〈明天〉置於夏目

漱石《虞美人草》的延長線上，指出小說中平行並立的空間形式——咸亨酒店與間壁的單四嫂子家，可以視為是對夏目小說中「原來死住在生的隔壁」這一觀念的演繹，她認為魯迅的小說《明天》蘊含了魯迅的「進化論」思想中“Natur”之道與「人」之道的內在爭辯。浙江大學英語文學研究所沈泓教授認為新文化運動的本質，就是要以嶄新的西方視角來審視和批判傳統的中國文化，以及用西方最新的理論來改造落後的中國社會及思想觀念，而戊戌年京師大學堂西學總教習丁韞良和其他幾位西教習在新文化運動中的貢獻，更值得我們今天來追溯和反思。他重點論述了丁韞良、秀耀春和裴義理三位西教習，指出他們不僅是真正的學者和科學家，還和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有直接的關係。

作為一場偉大的思想、文化和社會運動，新文化運動肇始了對中國傳統的主流意識、文化、歷史、習俗乃至文字語言的全面批判，導致了中國現代化的不同路線和派別的激烈爭論和分道揚鑣，在第二天的會議中，與會學者對此展開了討論。安徽大學歷史系湯奇學教授評述了新文化運動中的國語運動，他分析了1917年之前國語運動的發展和新文化運動中國語與文言的優劣之辯，並指出了國語運動的貢獻與不足。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陸胤博士則在教育史和知識史的背景下，重新梳理戊戌前後語文變革論的社會語境，關注甲午、戊戌之間蒙學新論致力於語言文字的側面，並強調正是教育普及新觀念下「識字作文」能力的突出，使得新式蒙學區別於以經訓誦讀為先的舊蒙學形象，並為清末民初的中小學「國文」教育奠定了基礎。他認為這一變化過程，雖受到西洋傳教士觀念和日本學制的觸發，但也活用了明清以來訓蒙實踐積累的經驗，「新」、「舊」資源處於一種混雜的狀態，實難以後來者取前人而代之的「革命」或「運動」思路來概括。

三聯書店的李靜韜博士也就新文化與語言文字的現代化關係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北京大學哲學系周程教授論述了電報技術對常用

漢字的影響，他分析了技術的引進與漢字發展之間的關係。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江弱水教授則重估了駢文的歷史價值，認為駢文在擴大詞彙量、凸顯單詞的感性質地、強化詞與詞的音義關係、萃取緊緻凝練的文體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優勢，大有裨益於中國人語言的形式感和思維的嚴密性，他指出從唐宋古文直到清末桐城派，中國主流的文章走的是一條載道之路，詞彙漸趨寒儉，思想益形枯仄。秉維特根斯坦語言的邊界即世界的邊界之說，中國人精神疆域的大小，與古文與駢文的歷史命運的起伏並非沒有聯繫。北京大學哲學系韓水法教授則論述了漢語作為學術語言的前景。

在另一個會場中，安徽大學歷史系沈寂教授以在新文化運動中有獨特地位的魯迅為例進行分析，他從陳獨秀、毛澤東及當今名家對於魯迅的評論入手重評魯迅的地位及「遵命文學」，認為魯迅的「遵命文學」，是自發的，對自己所信仰的東西，則自覺「遵命」，把它解讀為由於某種權威的威懾，而被動地「遵命」，或說成為配合某種政治「中心」任務而作。這是不符史實的，是臆測，或是以自身的經驗套用於魯迅。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李憲瑜則以《安徽俗話報》與《甲寅》為中心，探究陳獨秀的輿論經驗與尋求輿論樣式，她認為梳理陳獨秀自清末至民初、《新青年》之前的輿論經驗，發現其中的輿論「樣式」之尋求，有助於我們理解《新青年》作為一種思想界輿論雜誌的由來；而就陳獨秀而言，放棄《安徽俗話報》、退出《甲寅》，可以視為他在輿論樣式尋求過程中的「試錯」。前者意味著「白話報」這一清末以來重要輿論樣式的功能之耗盡，後者則顯示了民初菁英政論雜誌的困局。《新青年》雜誌的創辦，則是對二者的規避，並造就了「新青年」們的言論選擇。

浙江大學中文系教授姚曉雷認為中國上世紀以來的啟蒙與文學儘管是一對同路人，彼此也互相交集和支撐，但畢竟屬於未必盡同夢的兩個獨立範疇，各有自己的價值需求；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過程中所遭遇的一個最大誤區，在於沒有充分兼顧對方的獨立性，以至於啟

蒙為文學本體的正常發展背上了它承擔不起的包袱，文學也在對啟蒙的過分依賴中迷失了方向。他認為20世紀中國文學選擇啟蒙主題為開端，或許自有其歷史合理性，但並非唯一選擇；在以後的發展過程中繼續視其為最高價值訴求，未免存在開偏了頭和唱走了調的錯位；中國文學只有在它內在合理元素的基礎上擺脫「啟蒙」這一內在情結的正向和反向糾纏，讓啟蒙的回歸啟蒙，讓文學的回到文學，才能走上一條境界更為開闊的大路。

安徽大學歷史系教授陸發春認為在評述20世紀上半葉中國新文學發展歷史的學者來說，胡適對於新文學興起的歷史貢獻都是難以輕視的，他指出胡適的新文學歷史敘事與新文化運動的歷史總結，相互交織纏繞，而胡適「啟蒙歷史」建構的時間初成於1930年代，止於胡適離世，其歷史敘事是以新文化時期的中文文獻為基礎，胡適以大量發表的中英文文獻為基礎，進而把新文學發生和文學革命的歷史敘事，結構為以中國文藝復興為核心內容的中國現代啟蒙歷史，陸教授認為，其過程行立，胡適都有著清晰的思路和精心的敘事建構。安徽大學文學院的趙凱教授則從人民性問題的社會思辨、人文精神的失落與復歸、資源整合與時代創新這三個方面，探討了新文化運動與「中國化」百年同程的邏輯聯繫。安徽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汪楊以歷史境遇與文化氛圍為題，分析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安徽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情況，認為近代以來的安徽從社會結構、文化氛圍等，都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在本土的發生提供了一個優秀的文化之場，也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在全國的推進提供了一個獨特的力量之源。

在為期兩天的學術會議中，與會專家、學者共同探討了新文化運動在文學思想層面及其與社會政治的互動給現代中國造成的深遠影響，著重從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思想、文化和文學藝術成果，從百年以來中國的社會、政治、道德、教育等方面入手，回顧和反思新文化運動以來百年激盪的中國歷史進程，為研究新文化運動拓展新的領域和空間。